

有殘疾的學校領袖：重要的是傳遞你並不孤單——自身經歷 幫助他們為弱勢學生服務（下）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決定何時說出來

對於殘疾教育工作者來說，決定何時分享他們的經驗以及與誰分享是一個極其私人的決定。

有些人將他們的診斷保密；另一些人開始公開談論它以幫助學生和家庭。有些人是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在 K-12 難以獲得適當的資源和輔助後才這樣做的。另一些人則認為，展示自己的脆弱可以建立信任。

底特律學區的教育局長尼古拉·維帝（Nikolai Vitti）在職業生涯的早期並沒有分享他患有讀寫障礙症。

當他的大孩子（當時是維帝擔任首席學術官的邁阿密戴德區的一名學生）需要特殊教育服務時，情況發生了變化，他的家庭意識到該系統對 IEPs 學生的需求反應遲鈍（IEPs 意指「個別化教育計畫」是美國規定學校須針對每一位身心障礙學生設計教育計畫）。

這段經歷讓維帝不僅更加熟悉，而且更加敏感地意識到「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學生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學校系統未充分實施這些計劃的諸多原因。

「我認為講述我的故事很重要，因為我認為它鼓舞了很多學生，」維帝接著說：「我認為這也帶給了家長們希望，相信有時為了獲得學生需要的資源而與系統抗爭是值得的，並且當試圖應對特殊需求的挑戰，從而令人疲憊和沮喪的時刻，最終是可能導向成功的」。

一直到他成為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的教育局長後，維帝才對自己的讀寫障礙變得更加開放分享——這決定伴隨著一些個人風險。

但這些領導者的直言不諱促成了變化。

維帝和他的妻子瑞秋支持創建 GRASP 學院，這是一所學區支持的學校，為患有讀寫障礙的學生提供學區資金和慈善基金，他說這與主流教育一點也不矛盾。

「我想如果有極度的特殊需求，學生可能在學業上遠遠落後。」維帝接著說：「我們的願景始終是為學生提供強度的介入治療，[讓他

們]趕上並達到年級水準，然後回到主流療法，讓他們感覺更舒適」。

除了 GRASP 學院，傑克遜維爾的所有 K-12 教師都接受了奧頓-吉林漢姆學院(Orton-Gillingham Academy)方法的培訓，這是一種教育讀寫障礙學生的介入治療策略。

在底特律，多年的州政府「應急管理」讓整個系統都處於壓力之下，維帝再次利用他的個人見解，組建了一個團隊來改善殘疾學生及其家人的體驗。

特殊教育如今在底特律被稱為卓越教育。該學區從每學年缺了大約 100 個經過認證的特殊教育教師的情況中變為人手充足。

維帝說：「對於卓越的學生教育——這是一項重大成就」。

這些認證教師的薪水也有所增加，學區在家長和工作人員之間召開會議，重新評估每個因「應急管理」期間系統性錯誤分類而接受「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學生。他說，在許多其他變化中，投訴的數量，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下降了。

「必須承認的是，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不想給人一種我們已經達成了的印象」。但維帝接著說：「我們很多家長會說，作為家庭和學生，他們獲得了一種新的能量、一個更大的決心、擁有更強大的同理心及更強烈的反應能力」。

分享經驗可以建立同理心和能力

聽到大人的經歷也是學生的重要轉折點。櫻井記得有一對夫婦在畢業典禮後走近他，問他是否記得在他們兒子 5 年級的時候在學校的開放日和他們交談過。

他們和櫻井談過他們的兒子在拼寫時花了很長時間來完成書面作業和反轉字母。他們知道他很聰明，但他們無法弄清楚哪裡出了問題。他在那個故事中聽到了他自己生活的迴聲。他鼓勵這對夫婦與他們的兒科醫生、兒子的老師和校長談談。

「我認為與大家分享你並不孤單很重要，這沒關係，這就是你。」。夏威夷 Ka'ōhao 學校前校長溫斯頓·櫻井很清楚他不是在診斷學生——他也沒有能力這樣做。

「其中很多只是鼓勵他們與專業人士交談——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可以提供轉診的兒科醫生」。櫻井說明：「我為了家長著想，不希望他

們覺得他們是孤獨的」。

康崔拉斯與她的學區領導同事分享她作為殘疾人的經歷，以幫助他們擴大平等的概念。她說，當他們學到更多東西時，他們常常會感到驚訝不已。

她曾以自己是一名「平等領導者」而自豪，但在診斷後，康崔拉斯意識到她並不總是將殘疾學生納入考量。即使在設有平等辦公室的學區，關注點也往往是種族，有時是性別，而不是殘疾學生。

康崔拉斯說：「我談到了他們可以提供培訓，讓會議更容易參加，考慮他們在哪裡開會、會議中有哪些輔助措施，他們是否為參與者提供口譯員」。

她在自己的會議上做的一件簡單的事情是告訴人們不要說他們正在使用他們「戶外的音量」。或者認為自己這樣做每個人都會聽到他們的聲音。

「我們不能想當然耳認為人們可以聽到你的聲音」她說。

如果沒有參考框架，很難讓一些沒有殘疾的領導者看到，即使出於最好的意圖，他們也可能把一些員工、學生和家庭排除在外。

她說：「我們並不是要排外…我們認為我們做的是正確的事，但在有人分享經驗之前，我認為我們很難做出改進」。

這就是為什麼她認為有殘疾的教育工作者及領導者分享他們的經驗很重要。

康崔拉斯說：「我總是對我們這些有殘疾的群體說，不要感到羞恥，並儘量保持開放，因為當我們分享我們的經驗時，它會幫助其他人，難以想像多少人」。

有殘疾的教育工作者說，對學生開放同樣重要。曾就讀於哈佛教育學院的維帝與學生分享他的成就，讓他們也可以有遠大的夢想。

前吉爾福德縣教育局長康崔拉斯表示同意。

幾年前，康崔拉斯參觀了學區位於格林斯伯勒的傑佛遜小學，並受到了植有人工耳蝸的 12 歲學生莉亞·布朗(Leah Brown)的歡迎。

這次訪問是在康崔拉斯本人被告知她未來可能需要類似的植入物幾天後進行的，她說這個消息「宛如晴天霹靂」。

向學生提及這一點時，康崔拉斯發現自己成為巨大同理心和同情

心的接受方。

「她對我說『你會沒事的，你將會很棒，你不需要擔心』」。康崔拉斯回憶道：「這就像一部角色被顛倒的電影，因為她反倒安慰我」。

這次會面對莉亞來說也很有意義，她非常興奮，以至於她告訴她的母親諾娃·布朗(Nova Brown)，世界上最著名的人訪問了她的學校——她和她一樣是黑人和聾啞人。

布朗感到困惑，上推特詢問可能是誰。

「那對她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布朗說；「她非常興奮，幾乎把這個故事告訴了家族裡每個人」。

布朗說，康崔拉斯從這次遭遇中得到的收益與莉亞一樣多，這也同樣值得訴說。

「這是我第一次有人告訴我，我的孩子對他們的人生產生了影響」。布朗說：「這讓我不禁熱淚盈眶」。

莉亞寄了一張卡片（用蠟筆劃了一個人工耳蝸在教育局長耳朵上的畫）來鼓勵康崔拉斯。

莉亞最喜歡的科目是閱讀，長大後想成為一名藝術家、保姆和其他許多角色，她從遇到康崔拉斯的經驗中獲得了巨大的啟發。

「如果她能做到，而且她和我一樣有殘疾，那麼我也能做到」莉亞這樣說。

康崔拉斯還收到了學生們的來信和電子郵件，詢問她的聽力損失：你小時候有戴助聽器嗎？你和我一樣聽不見嗎？你的小助聽器是從哪裡弄來的？

「青少年問我，會有人愛他們嗎？我向他們保證，他們會墜入愛河，他們會分手，他們會再次墜入愛河」。康崔拉斯說；「我讓他們知道，任何重要或有價值的人都不會因為他們有聽力損失、耳聾或是佩戴助聽器或人工耳蝸而反對他們」。

撰稿人/譯稿人：Denisa R. Superville /翁而真

資料來源：Education Week (2022.08.10)

<https://www.edweek.org/leadership/school-leaders-with-disabilities-its-important-to-share-that-youre-not-alone/2022/08>